



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文科学士）

毕业论文精选精评

哲学卷

周国平 / 主 编



西苑出版社
XI YUAN PUBLISHING HOUSE



新世纪中国大学生
(文科学士)毕业论文

精选精评

哲学卷

◎周国平 / 主编

西苑出版社
XI YU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文科学士)毕业论文精选精评·
哲学卷/周国平主编.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2

ISBN 7-80108-628-7

I. 新… II. 周… III. 哲学—大学生—毕业论文—汇编—中国 IV. G64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986 号

哲学卷

主 编 周国平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话 68214971 传真 68247120

网 址 WWW.xybs.com E-mail aaa@xybs.com

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80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628-7 / G·266

定价:20.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哲学系学生的素质教育

在学者的成长历程中，大学本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读本科的大学生很多，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将来适合于从事学术。一个人在学术上有无发展前途，在本科阶段大致可以看出来。就哲学系的学生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看是否培育起了两种能力：一是哲学思考的能力，二是做学问的能力。

其实，对于任何学科的理论研究来说，哲学思考的能力都是重要的，它体现为一种超越学科界限的宏观视野，一种从整体出发把握本学科中关键问题的领悟力。凡不具备相当的哲学悟性的人，是很难在任何领域成为大学者的。毫无疑问，这个道理在哲学研究领域中就更加不言而喻了。一个不具备哲学思考能力的人，他所从事的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研究，他不但不能以哲学的方式处理所面对的问题，甚至会把完全非哲学性质的问题选做自己的课题。因此，如果说哲学系学生的素质教育，我认为第一重要的就是培育哲学思考的能力。在这方面，一个有效途径是阅读哲学史上的基本著作，在阅读中注意追踪大哲学家们在那些最重大往往也最困难的问题上的思路及其异同，由此而使自己也进入这些问题之中，把这些问题或其中之一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

其次重要的是培育做学问的能力。在确定了自己的问题领域和研究方向之后，就要锤炼做学术工作的基本功了。这大致上是指，围绕所选定的课题系统地搜集和整理资料，做到对于

在此问题上既有的研究成果有全面和清晰的了解，获取扎实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径。同时，学术能力还包括一定的写作能力，要善于用文字表述研究的收获。这些都是必须下苦功的事情。据我所见，有的人有良好的哲学悟性，却短于此项，结果仍不能做哲学的研究工作。

当然，在实践中，这两种能力的培育并非截然分开的。我想强调的是，一个哲学系学生如果确实有志于以哲学研究为自己的事业，他就理应在这两方面都打好基础，使自己兼备哲学家素质和学者素质。

西苑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请我为哲学卷作序，我就写了以上这些话。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卷的论文是业已选好送到我面前的，因此，我只是做了第一个读者而已。以上的话包含了我读这些论文时的一种评价标准。我所欣赏的论文具有这样的特征：一、论题小而具体，而非大而无边；二、内容扎实，而非泛泛议论；三、有哲学底蕴，而非用别的话语方式取代哲学思考；四、有一定创见，而非完全重复他人之见。应该承认，本卷所收论文的水准是相当不平衡的，其中确有佳作，至于是哪几篇，恕我不说出我的一家之言，请读者各以自己的眼光评估吧。

周国平

2002年4月4日

出版者寄语

《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文科学士）毕业论文精选精评》丛书从策划到出版历经了一年的时间。在该选题上马之前我们的心是提着的：我们不知道象牙塔里的人们是否会支持我们的动议；我们担心为了填补出版的空缺而要承受过重的风险负担。很欣慰一年的努力终于有所回报，它们清清爽爽的摆在了读者的面前。

谨对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热心地为我们供稿的二十二所高校的领导和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严谨的治学风范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同时对他们在为学生做事时流露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感表示深深的敬意。请原谅我们无法在编委名单中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这套丛书所收入的毕业论文全部由学校推荐，其中的二百多位作者我们一个都没有见过，但这丝毫不能影响对他们的感谢之情，感谢他们年轻的心和活跃的思维为所有的读者奉上这份精神大餐。感谢担任主编的十位专家，感谢他们的热心参与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阅论文，提出中肯的意见，真诚地为书做序，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学者们迷人的人格魅力。感谢季羨林老先生一直以来对本书的关注，知道季老一直很关心学生、赞同为大学生做一些事时，我们倍受鼓舞。

丛书出版终于在这样一个收获的季节尘埃落定，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轻松：一本这样的书，将要面对这样的一群人——书中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每想到此我们都如履薄冰。仅能借此小角落来说几句由衷的话，因为书的主角已经如此的灿烂夺目，做为出版人我们也只能“心安理得”的在小角落了。

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文科学士| 毕业论文精选精评

目录

(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序)



上篇：东方哲学

“五四”启蒙：徘徊在历史与价值之间

[1] 兰州大学 刘清涛

中国书画之美

[18] 兰州大学 刘雪峰

试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28] 山东大学 张路园

张载的“民胞物与”论

[38] 山东大学 张健捷

从殷周天命思想的发展理解孔子的天命观

并进而谈孔子学说的宗都性

[47] 北京大学 姚福燕

孔墨哲学思想之比较

[70] 山东大学 唐明燕

人生的困境与超越

——庄子论“用”与“无用”及其意义

[79] 武汉大学 郭 慧

中篇：西方哲学

“逻各斯”的言说

[92] 吉林大学 王 立

休谟的因果论

[108] 中国人民大学 朴光哲

人诗意地存在着

——试论海德格尔的诗思同源

[121]

兰州大学 师庭雄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及其自我观

[131]

中山大学 李文

罪者：作为自由意愿的自我

——奥古斯丁《论自由选择》对自我的生存论读解

[145]

北京大学 吴天岳

论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175]

武汉大学 周玄毅

什么是形而上学

[188]

兰州大学 杨伟清

曲径通幽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主要思想探幽

[202]

兰州大学 邹晓莉

论叔本华直观认识论的意义及其影响

[212]

南开大学 徐丽云

人群中的艺术

——简论维特根斯坦后期审美理论

[223]

复旦大学 韩梅

下篇：原理运用及其他

大学生人际沟通中存在的心理问题及自我解决

[234]

武汉大学 张付荣

从摩门教与科学学派看新兴宗教在世俗化进程中的表现

[241]

中央民族大学 李光

“实事求是”之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精髓的历史继承性

和时代前瞻性

——论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基础

[251]

中国人民大学 范珊珊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及其现实意义

[265]

中国人民大学 侯文蓓

试论网络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抉择

[277]

浙江大学 胡卓群

论人的观念现代化

[292]

北京大学 席加省

试论实践哲学的理论方式及其合理性

[305]

南开大学 谢永康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317]

山东大学 鞠 晗

上 篇

东 方 哲 学





“五四”启蒙：徘徊在历史与价值之间

作者：刘清涛
学校：兰州大学
年 级：97 级
院 系：哲学与社会科学系
专 业：哲学
指导老师：刘开会（副教授）

内容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启蒙。它奠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现代方向，但却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而未完成现代性的价值整合。启蒙的彷徨与蜕变，虽然有其外在原因，但其内部之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歧异，则是其更为深刻的原因。本文从现代历史语境中启蒙内在的价值冲突，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固有矛盾以及启蒙擅变的内在思想原因。

关键词：“五四” 启蒙 历史理性 价值理性 现代性

一、历史语境决定了启蒙失败的命运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是对辛亥共和制度失败的历史回应。用美国学者舒衡哲（Schwacz Vera）话说，它是一种“后政治启蒙”^①。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却社会腐败积弱依旧，而神圣的共和旗帜成为袁世凯窃国工具的严酷现实，打破了戊戌以来制度万能的迷信。而民初甚嚣尘上的尊孔进流，则进一步凸现了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症结，于是变革民族文化心理的启蒙被提上了时代的日程。辛亥“共和幻象”给改革者最大的启示在于，社会文化是一体化的，没有

^① 参阅 [美] 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文化价值的变革和国民心理素质的改造，任何改革制度的尝试都难免流于形式。梁启超在回顾辛亥后的历史进程时指出：辛亥以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而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① 陈独秀则把清末以降中西冲突所引发的变革运动归为由学术的觉悟到政治的觉悟、进而到伦理的觉悟的演进过程，并把“伦理的觉悟”归为“彻底的觉悟。”^② 这种“伦理的觉悟”和“全人格的觉悟”，就是召唤“五四”启蒙的历史动因。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课题，是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国民性格的再塑。启蒙学者洞察到中国传统价值系统与现代性之间深刻的时代差异，因而大力鉴取西方现代文化，试图通过批评和改革传统，来改造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而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启蒙学者看来，要更新中国文化必须取之西方现代文化，其精华为民主和科学。康德认为，启蒙的本质在于“自我的解放”。“五四”启蒙学者以欧洲启蒙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力倡人的自由和解放。在著名的启蒙宣言《敬告青年》中，陈独秀通过倡言“人权”和“科学”，揭示了人的自由和启蒙的思想话题。他在文中把欧洲近代历史归结为人的解放的历史，以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宗教解放、妇女解放来阐释“人权平等”的民主运动，把“科学法则”归为破除迷信和蒙昧禁锢的思想解放的理性工具，并将科学视为提高生产效率以增进人生幸福的有效手段。而陈氏所谓的“解放”，其要旨则在于“自由”：“解放云者，脱离无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③ 陈独秀的“人权”与“科学”以人文主义精神为基底，他把两者视为自我解放的必由途径。欧洲近代人文主义的价值基础是个人，人的解放首先是“个人的解放”或“自我的解放”。因而确立人文主义价值观，首先要求批判中国传统的社群至上的价值取向，而实现价值主体由群体人伦到个体人格的转换。新文化运动之启蒙的中心主题，即在于以个人主义

① 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34、724、729 页。

② 《青年杂志》一卷 6 号。

③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9、126~127、434、252、244、592、252 页。





取代群体主义的价值转型。陈独秀号召“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胡适高扬易卜生的“个性主义”，李大钊倡言“自我的解放”，鲁迅主张争“人的价格”，周作人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来阐扬“人道主义”，高一涵力主“小己主义”，其要旨都在倡导一种现代人文主义价值观，以唤醒国民的自我意识，从而实现个性解放的价值转型和精神变革。

中西文化在价值结构和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根本差异。前者以人伦的和谐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后者则以个性的自由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五四”启蒙学者洞察到这种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价值观的深刻差异，并且鉴取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武器，对儒家伦理开展了激烈的批判。在启蒙学者看来，儒家伦理的要害在于无视人的主题价值和人的尊严，而以义务本位的孝悌之道，抹杀人的个性和个体的独立人格，从而使人丧失其主体地位而沦为族权、夫权、皇权的附属物。这种吞噬个性的伦理专制主义，造成了窒息民族生机的劣根性，它是和尊重人的价值、崇尚人的自由创造精神的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因而要实现文化转型和模塑现代公民人格必须破除以礼教纲常为基础的传统价值系统。陈独秀、鲁迅、吴虞和李大钊等人对儒家礼教的反思和批判，贯穿着立足于现代人文主义的深刻理性精神。

“五四”启蒙学者的文化选择，是其对寻求丰富的现代化历史语境的回应。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其说源于“人的发现”的形而上哲思，毋宁说出自民族救亡的现实需要。正是从对中西冲突形成的文化危机的反省中，他们体认了西方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时代落差，从而做出了引荐西方现代性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抉择。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中强调中西文明代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西洋文明代表“近世文明”，而中国文明尚未脱“古代文明”窠臼，中国要走现代化必须鉴取西洋文明，尤为向欧洲文明的先进法国文明学习。陈独秀的启蒙思想充满救亡的忧患意识，在他看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救于灭亡之命运，迫在眼前。”^① 陈对人权和科学的倡言，亦为此民族忧患意识所驱策：“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

^① 王光选：《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 1987年版。

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①这种源于殖民化危机的寻求富强的救亡式现代化诉求，成为“五四”启蒙的特定历史语境。

二、历史与价值：启蒙世界观的二元张力

享誉“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以激烈的西化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为基本特征。然而，启蒙与传统的断裂性，并非新文化运动的惟一面相。实际上，“五四”“全盘反传统”的激进表象遮掩了启蒙与传统的深刻的连续性。中国由民族危机所导引的启蒙运动，匮乏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个人的发展”的人文历史语境，因而其模拟西方启蒙的自由主义伦理革命，不能不具有“爱国的个人主义”的取向，这是中国启蒙的一个基本的价值矛盾。另一方面，启蒙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互动的文化转型过程。大凡文化无不具有稳定性或保守性，尤为中国文化这样历史悠久的高等文化。诚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托马斯·哈定（Thomas Harding）所言：“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变化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②价值秩序作为文化系统的“基本结构”，由于文化稳定性的深刻作用，其变革和转型是至为艰难的。在殖民地现代化语境中，当本土文化价值主要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外部压力而不是传统自我变革的内在挑战时，这种价值变革的驱力往往是有限的。外域强势的西方文化可以冲击传统文化的表层的价值规范，却难以触动其深层的价值原则。即便在最激烈最自觉地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这种本土文化的稳定性和历史惯性显而易见。且不论启蒙运动对国民文化心理改造的程度和效果，仅就启蒙者自身的深层价值取向而论，其显然仍未摆脱传统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从“五四”启蒙者的世界观中清晰地看见这一点。辛亥革命以来，伴随着帝国政治秩

①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4、9、126～127、434、252、244、592、252页。

② [美]托马斯·哈定：《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14页。





序的崩解，传统文化价值亦陷于危机。因而，世界观的重构就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课题。在启蒙运动之意义世界的重构中，深刻地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新人生观是启蒙世界观的重要内容，重阐人生意义是新文化运动价值整合的重要课题。而正是在生命意义这一终极价值问题上，启蒙者表现出深刻的价值矛盾。他们一方面体认了西方人文主义之个体本位价值观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则依然崇尚中国人生价值之群体本位的无我境界。对儒家伦理持激进批判态度的“五四”启蒙学者，在人生理念上则表现出中西二元价值取向。陈独秀一方面力倡“个人本位主义”，强调“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执行意义，满足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另一方面又主张“个人之在社会，好像细胞之在人身”，“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①。在陈看来，“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底最大问题”^②，质言之，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胡适人生观的二元取向更为显著，他在《易卜生主义》中用西方人文主义观点倡言“个性主义”，而在《不朽》中则主张社群至上的“社会不朽论”。他强调，个体“小我”依赖于社会“大我”的存在，“小我”是有限的，“大我”是无限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不朽的。“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贻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③在胡适看来，个人对社会负有责任，个人只有通过社会整体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易白沙对生命之意义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在“我”一文中，既阐扬了自我的个体人格意义，又强调了“大我”重于“小我”的思想，他认为：“有牺牲个体小我之精神，斯有造化世界大我之气力。……故曰二者相成而不相悖也。由先后之说，必有我而后有世界。由轻重之

①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9、126～127、434、252、244、592、252 页。

② 同上。

③ 胡适：《朽》，载《新青年》6 卷 6 号。

说，必无我而后有世界。有我者，非有我，亦非无我。我与世界无须夷离。无我者，非有我，亦非有我，个体之小我亡，而世界之大我存。”^①李大钊则以佛学语言表达了他融小我于大我之中的人生理念：“在宇宙大法中，个体是为全类存在的，全类不是为个体存在的，所以人群比个人在宇宙中更有个真实的地位。”^②此外，高一涵在《一九一九年预想之革命》，傅斯年在《人生问题发端》中，都表达了类似的人生理念。^③

显而易见，“五四”启蒙学者这种崇尚社群、主张融“小我”于“大我”之中的人生理想，带着鲜明的中国传统印记，它是儒、佛、道生命体验和超越意识在“五四”时代的交汇回响。美国汉学家张灏将这一把小我融入大我的思想，概括为“无我同一”，并将其归结为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主题之一。他认为，这种“无我同一”理念，源于儒、释、佛、道等中国传统中的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意识，以及个体生命存在与融化自我以复归原始整体的“分离与回归”人生范式。这一传统的思想主题，深刻影响了包括“五四”知识分子在内的20世纪中国各派知识分子的思想^④。

除了新人生观，新社会理想是“五四”启蒙者世界观重构的又一重要主题。我们看到，在对未来社会的展望中，启蒙者亦并没有完全接受西方现代性和否弃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初，陈独秀就明确指出：“吾人理想中之中华民国，乃欲跻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架而上之，以去其恶点而取其未及施行之新理想。”^⑤陈的这种超越西方的“新理想”，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传统的理想主义。《新青年》创刊伊始，陈就在倡言人权和科学的同时，批评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由竞争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流弊^⑥。以后他在倡导民主主义的同时，

① 易白沙：《我》，载《青年杂志》1卷5号。

② 《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 1884年版，上卷第196、560、565、607、下卷第16、16、96~97页。

③ 恽代英：《论社会主义》，载《少年中国》2卷5号。

④ [美]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结论，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⑤ 《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⑥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4、9、126~127、434、252、244、592、252页。





赞扬孔子“均无贫”和许行“并耕”的高远理想。李大钊认为中国农业文明“衰退于静止之中”，而西方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世界文明的未来必有赖于“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的“第三种新文明之崛起”^①。恽代英则对西方近代文明持更激烈的批判态度，其新社会的理想也更明显地带有传统理想主义的色彩。他认为，“文明亦仅富贵者之事。综而论之，盖文明者，杀贫贱以利富贵也。……吾直谓文明为万恶之凶手而已。”他憧憬的是平等和谐的大同社会：“若夫大同之世，无贫富贵贱之阶级，无竞争防御之忧患，而后利人类之文明日益发达，可以作福全世。”^②

“五四”启蒙学者这种具有抵抗和超越西方现代性取向的社会理想，体现了中国思想传统的深刻影响。在近世中国，以儒家大同和谐、释道平等和墨家兼爱为要旨的古典理想主义具有复苏的趋势，它与由救亡驱动的中国现代化思潮相激荡融合，构成了一种抵抗的现代性取向。这种中国古典主义不仅没有被西化的大潮所湮没，而且通过与西方近代乌托邦思潮的汇流而得以强化。我们可以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民主主义”中，清晰地看到这种乌托邦趋向。即便在最激烈地倡言西化和批判传统的“五四”时代，这种理想主义传统仍深刻地影响着启蒙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五四”时期以儒教为基础的传统意义世界的解体，为古典理想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思想空间。同时，这种殖民地现代化语境中的理想主义与民主主义情绪和进化论思潮相结合，形成了启蒙时代的浪漫精神。诚如张灏所说：“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而实际上它确实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重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③

“五四”启蒙运动的这种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思想矛盾，源于启蒙知识分子思想中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张力。“五四”知识分子迎受西方现代性和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精神，

① 《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 1884 年版，上卷第 196、560、565、607，下卷第 16、16、96~97 页。

② 《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19 页。

③ [美] 张灏：《“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载《当代》（台北）创刊号，1986 年 5 月。